

---

# 论近代上海教育发展中的民间参与

施扣柱

---

【摘要】民间参与是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大因素。其参与形式多样,其中捐款和设立基金会是浅层次的参与,组建教育社团、编纂出版教科书籍和教育类专业杂志、办理私立学校属深层次的参与。近代上海教育发展中的民间参与,囊括了诸种形式,堪称全方位的参与格局。其形成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先天性开放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其维持是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巧妙博弈的结果,其最大价值是教育民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关键词】近代上海;教育发展;民间参与

【中图分类号】K295.1;G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3—0010—11

【作者简介】施扣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00235

民间参与是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大因素,在常态社会中它与政府的规划管理共同构成教育发展的两大基本合力。教育发展中的民间参与形式非常丰富多彩,大体可概括为浅层次参与和深层次参与两大类,也可归纳为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两大类。分而言之,民间的教育捐款和设立教育基金会是履行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义务,是浅层次的参与;组建教育社团、编纂出版教科书籍和教育类专业杂志乃至直接办理私立学校是行使民众的教育参与权利,属深层次的参与。在民间缺乏表达教育意见和建议的充分渠道、对教育决策影响甚微的前提下,只有或主要拥有教育捐款义务而缺乏充分教育参与权的民众绝不是一种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姿态。所谓充分的教育参与权至少应该包括:在履行物质性的踊跃捐输义务之外,民众在法律框架和公序良俗底线内可以运用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权表达自身的教育诉求、按照各自对教育的不同理解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如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民众对教育既慷慨地捐钱捐物,又积极地组建教育社团、编辑出版教科书和教育类专业杂志,乃至直接办理私立学校,那么这个时期的教育发展一定充满活力。近代上海教育发展中的民间参与就是这样一个鲜活的历史案例。

## 一 捐款与设立基金会

捐款与设立基金会是民间因素参与近代上海教育的第一大表现形式。它分为捐款和设立基金会两个层面。一般而言,捐款单笔数额较小,但捐款人数较多;基金数额较大,但有经济能力设立基金会者较少。捐款助学可再分为校外和校内两种。校外捐款者来自校外,一般指定受助学校但不指定受助学生。校内捐款者来自校内,一般指明受助学生条件。校外捐款又称社会捐款,其社会影响较大,清末民初政府捐资兴学奖励大多针对此类。校内捐款则由校内教师或校友捐助本校学生,社会影响较小,但针对性较强,学生同样受益。教育基金数额较大,一般由财力雄厚者设立,管理比较规范,有比较明确的资助目标、条件和程序。

近代上海民间财力较为丰厚、兴学热情较为高涨,社会捐款助学历来比较踊跃,普通民众也积极参与。笔者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资料统计,仅民国肇建至1924年的13年间,上海就有64人、5个机构共计捐助了276 557元,受助学校12所,其年均捐助21 273元、校均受助23 046元。捐

助者中,除袁树勋、吴馨、张謇、梁士诒、聂其杰五人拥有官职外,绝大多数为平头百姓。受助学校以私立学校居多,也有若干公立学校。<sup>①</sup>

近代上海整座城市的校内捐款助学几乎难以量化统计,因其过于分散与众多,有些学校甚至没有留下相关统计资料和文字记录。但据现有资料可知:不少私立学校大多依托捐款设有数量不等的奖/助学金,<sup>②</sup>有些校长和教师还主动关心非富家子弟的学习和生活,主动给以经济资助。有的校长如南洋中学的王培荪先生还极其人性化地考虑到受助学生的自尊心,不在校内公布受助贫寒学生名单,令这些学生感动不已。<sup>③</sup>近年兴起的口述访谈也可帮助比较缺乏文字记载的学校重新建构起相关记忆。如笔者曾访问圣芳济学院校友周斌章,据其回忆,因抗战期间经济不景气,其在电力公司任职的父亲收入减少,使其支付学费产生一定困难。但他学习成绩很好,曾获《申报》助学金及学校往届毕业生的几次资助。这些已毕业校友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财力,也愿帮助和回馈母校,学校就介绍像他这样学习成绩较好、家境相对比较清寒的学生,请他们捐助学费。程序是:先由学校与他们取得联系,再给需要资助的学生出具校方证明,然后由需受助学生前往捐助人处领取定额支票,交到学校作为学费。<sup>④</sup>

近代上海民营经济相对发达,民间教育基金比较活跃,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吴蕴初清寒教育基金、叶鸿英乡村教育基金、史量才奖学金基金、叔苹奖学金等。

吴蕴初清寒教育基金会,1931年由吴蕴初发起并捐款成立,旨在资助学业优秀、家境清寒的子弟升入大学学习。该基金会委托中华化学工业会协助组织考试委员会,每年经过考试选拔大学一年级化工系学生和高中一年级学生各10余人发给奖学金,成绩保持优良者可领到毕业为止。基金会并在沪江大学化学系设立奖学金,奖励学业优秀青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拨款捐办理化教室,帮助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还以化学工业的学理研究与实际调查为课题,设立天厨化学征文奖,奖金由天厨味精厂捐赠。1931—1938年该基金会共举行6届招考,录取100余人,为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和培养中国科学技术人才的培育做出了贡献。<sup>⑤</sup>

鸿英教育基金会,1932年由上海千万富商叶鸿英捐助5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1万两)建立,内10万元指定专办乡村教育,计划在上海的10个郊区各建一所“鸿英乡村义务小学”;40万元用于扩充人文图书馆。翌年9月,该基金会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沪西漕河泾开办鸿英师资训练所,在沪郊筹设乡村教育实验区,开办4所鸿英小学,使附近学龄儿童与失学成人均获上学机会。<sup>⑥</sup>

量才奖学金基金团,1935年史量才逝世后,其遗族史庞明德等为缅怀遗志,捐献国币16万元设立之。其章程规定以该基金之利息奖励学术。奖励方法为:高中最优等毕业生无力升学者补助学费,国内公私立大学学生家境清寒成绩优异者补助学费,国内大学最优等毕业生欲赴国外留学而财力不足者补助留学费,国内外各大学优等毕业生毕业后专门研究一种学术而资历不足者酌助研究费,对于学术有特别发明或重大贡献者赠给奖金。<sup>⑦</sup>1936年6月,曾聘翁文灏等为审议委员,举行第一届理工研究生征求事宜,有6人获得补助研究费,研究专业分别为化学工程科、电机工程科、矿冶工程科,以及物理、生物等科。<sup>⑧</sup>

①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教育杂录第六,捐资兴学一览,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294—352页。

② 如大同大学有立达、明德、馨德、厚德学员奖学金制度和特待生免费制度,参见《大同大学章程》,第36—37页。圣约翰大学历史上至少有五种奖学金、五种贷学金和五种减免费办法,详见《圣约翰大学章程汇录》1909.9—1910.7,第46—47、51页;1911.9—1912.7,第54—55、60页;1917.9—1918.7,第127—128、135—136页;1918.9—1919.7,第134—135、143页;1919.9—1920.7,第115—117页。《圣约翰大学一览》1934—1935年度,第54—55页;1937—1938年度,第57—59页。

③ 曾石虞(南洋中学1917届校友):《南洋中学忆旧》,参见《上海市南洋中学建校100周年》,该校编辑出版,第72—73页。

④ 2004年8月26日周斌章访谈资料,施扣柱访谈并整理。

⑤ 《上海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3页。

⑥ 《上海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8—1259页。

⑦ 《财团法人量才奖学金基金团成立文件》,第1页。

⑧ 《财团法人量才奖学金基金团成立文件》,第1页。

叔莘奖学金,1939年,上海怡和源打包厂经理顾乾麟为实现其父顾同藻(字叔莘)遗愿而设。当年即登报接受申请,首期考取50名。以后每年春秋两季招收,每期名额400多人。还在大华路(今南汇路)设“叔莘图书馆”,建同学会和理化实验室、打字速记班、缝纫班、看护班、国术班等;另设理发室、免费特约诊所、特约眼镜公司免费配镜等。1941年底日军进占上海租界,顾乾麟所在工厂货物及个人财产均遭查封冻结。为免获奖同学因经济困境再度失学,顾乾麟毅然变卖部分流动资产和私人首饰,继续坚持办理该奖学金。1949年5月离沪赴港暂住时,顾乾麟还不忘特意筹款汇至上海等地叔莘奖学金同学会。<sup>①</sup>

以上形式各异的教育捐款与教育基金会有一个共同点非常值得关注,即其操作上的直接与透明。其中,社会教育捐款直接捐给指定学校,校内捐款直接捐给符合条件的学生。教育基金会则实行董事会集体管理,审议受助学术事项时,由董事会临时聘请专门学者为审议委员。另设保管委员会,负责保管基金。换言之,在这些民间教育资金的运作过程中,捐助者完全知晓所捐资金的走向与用途,地方政府或教育行政机构并不插手其间,社会其他非捐助者也休想染指或借其营利。这是真正的非营利教育捐款和教育基金。这样的直接型教育资助模式,保证了教育资助行为的比较透明、阳光和高效、实效。

还要指出的是,近代上海民间资金参与教育的作用,不能仅以慈善视之,应该看到其实质是在政府和民众之外提供了第三种教育经费来源,也提供了政府全包和完全或主要由民众承担教育经费之外的第三种模式。它帮助缓解了政府和民众两个方面的经济负担压力,也疏导了弱势民众因上学贵上学难而容易产生的对政府的抱怨、对社会公正的失望。<sup>②</sup>民间资金参与教育,实质上起到了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和社会秩序的稳压阀的重要作用。

## 二 组建教育社团

组建教育社团是民间因素参与近代上海教育的第二大表现形式。

近代上海民间教育社团有几个显著特点。其一,早期建立者多为综合性社团,如中国教育会(1902)、群学会(1904)、上海教育会(1908)等;越往后建立者越多为专业性社团,如教育法令研究会(1916)、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立达学会(1925)、念二社(1933)、中华艺术教育社(1934)、科学建设促进社(1935)、父母教育研究会(1935)、中国识字教育社(1938)等。这种状况反映了教育社团建设随着教育发展愈益细分化、专业化的趋势。其二,有不少全国性教育社团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地点。如中国教育建设社(1924年在上海成立)、中国民生教育学会(1936年在上海成立)等。这既是由于上海教育的相对发达为民间教育社团开展活动提供了良好基础,也为上海教育提供了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为上海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三,除个别社团如蔡元培先生清末组建的中国教育会名为兴办教育、实为鼓吹革命外,其他均系名实相符的教育社团。这与江南地区民性较为平和有关,也与近代上海经济与文化较为发达有关。近代上海大量民间教育社团的所有努力,是为了改革当时教育发展的不合理、不健全之处,而非将整个社会体制全盘推倒。这种建设性的温和态度与立场,不仅为其自身赢得了充分的生存空间,也为其所倡导的教育改革理念和行动赢得了充分的施展机会。其四,近代上海教育社团特别注重其活动的开放性,并不满足于关起门来围着几个教育概念坐而论道,而是积极走向社会,办展览,做指导,出丛书,搞实验,把教育改革事业做得风生水起,颇有看点。

中华职业教育社堪称近代上海民间教育社团之中翘楚。其专业活动领域——职业教育可谓

<sup>①</sup> 《上海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3页。

<sup>②</sup> 近代上海虽有一定数量的适龄文盲人口,但也存在着一个相当数量的非富家子弟乃至寒门子弟学生群体。参见施扣柱:《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第九章“非富家子弟的求学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443页。

抓住了近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本质区别:作为精英教育的传统教育主要培养的是后备官吏,而作为大众教育的近代教育主要输送的是大批合格的普通劳动者。培养目标的不同决定了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的不同。对前者而言,人文经典的学习足可应对;对后者而言,应用型知识技能的掌握非常重要。而且,面对变动不居的就业市场,近代教育必须将市场对人才和知识的需求变化纳入考量范围,而不能只知关门传授即将或已经过时的知识门类。因此,中华职教社非常注重沟通学校与社会、教育与职业的关系。除直接办理中华职业学校以为职业学校示范、办理比乐中学以为普通中学实行职业教育示范,以及办理商业类业余补习学校实行工商补习教育、办理上海市小学校中央木工教室实施小学职业陶冶、办理职工教育馆提倡劳动者休闲教育等实体性职业教育活动之外,在专业化职业指导工作、在校生职业意识的养成和职业学校成绩推介等方面,也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它在全国率先倡导出资成立了第一个地方性民间免费职业指导机构——上海职业指导所,聘有专门的测验指导委员和指导顾问。其主要活动涉及职业指导的每一个细节,如职业谈话、职业咨询、职业调查、职业讲演、职业测验、职业介绍、择业指导、改业指导、协助各校职业指导、升学指导、编辑刊物、调查统计等。特别注意了解人才供需双方的各自特点和要求,努力使之互相匹配。甚至在介绍职业成功后,还主动征询双方意见,为以后的工作提供改进的依据。<sup>①</sup>因为这种极其细致、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该所在谋求职业的青年和用人切切的企业之间架起了一座相互理解、双向选择的桥梁,深得双方信任和好评。

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十分重视在校生的升学指导,尝试将择业意识融于升学指导之中。1933年6月21—25日,曾与上海职业指导所联合发起升学指导运动。运动期间,分别举行大学日、职业教育日、中学日、女学日等活动,邀请相关教育专家莅临演讲,深受学生欢迎,各校学生前往听讲者日均达四五百人。现场还陈列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四家书局出版的有关职业指导书籍,及上海职业指导所制作的有关图表等。并每天举行个别谈话、性能测验等活动,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个性和职业适应的匹配性。<sup>②</sup>

为增强职校学生的自信和社会对职业学校的信任与了解,中华职教社用心组织了数次职校成绩展览会,较著名的有全国第一期职业学校成绩品展览会和第一届全国(东部)职业学校出品展览会。前者于1918年5月在沪主办,江苏省立第二农业学校、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等27所职校参展。展品涉及农业、水产、金工、木工、染织、刺绣花边和小学校用品等数千件,多为应用商品。展品均标以生产时间和销售价格,供参观者购买。<sup>③</sup>后者系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共同发起,1922年2月1—7日在中华职业学校内举办,江、浙等8省50所职校参与。展览分设金工、木工、农林水产、儿童保育、家庭卫生与参考书、藤竹工、农产染织与商业化学工艺、女子工艺、家庭衣食住等各部,展示了各职校学生制作的相应物品三千余件,参观者达万余人。<sup>④</sup>诸如此类展览会的举办,展示了职校学生的成绩,扩大了职业教育的正面社会影响。<sup>⑤</sup>

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代表的近代上海民间教育社团的组建和活动,以有组织的集体力量整合了志同道合者,破除了中国传统社会“君子不党”的清高理念,和对圣贤个人道德感化力量的过度迷信。他们的集体呼声和行动,改变了教育改革家单兵独斗、孤立无援的弱势与无助,扩大和增强了其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

① 《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职业指导所一览》,上海职业指导所印行,民国24年1月版,第65—70页。

② 《上海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2页。

③ 《教育与职业》第7期(1918年6月)“本社第一届年会纪事”,第2—4页。

④ 《申报》1922年2月6日,《申报》影印本177—538—(3);《教育与职业》第36期“中华职教社第五年度社务报告”,第5页。

⑤ 沪语“职业”与“作孽”发音相近,守旧者有以“作孽教育”讥讽“职业教育”者,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脱离物质生产的上层人物,职业教育却培养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岂非作孽?展览会展示的职校学生成绩,令人亲眼目睹职业教育促进社会经济生产的作用,不啻为有力的回击。

### 三 编辑出版教育类专业杂志

编辑出版教育类专业杂志是民间因素参与近代上海教育的第三大表现形式。

近代上海拥有近代中国创刊最早、刊龄最长的教育类专业杂志。其中,《教育世界》创刊时间最早,也是1907年以前中国私人创办教育杂志中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者。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刊行时间最长,历时近40年。其他刊龄较长的有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约33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教育与职业》约32年,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约28年。在近代中国刊龄30年以上的4种教育类杂志中,上海占了3种。

近代上海教育类专业杂志的创办者、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多为文化大家,极一时之选。如:《教育世界》创办人罗振玉,主编王国维,主要撰稿人张元济、罗振常等。《教育杂志》历任编辑陆费逵、朱元善、李石岑、周予同、唐钺、黄觉民、赵廷为、李季开等,主要撰稿人黄炎培、蒋维乔、严复、李廷翰、陈鹤琴、蔡元培等。《中华教育界》前期由倪文宙编辑兼发行,1947年1月复刊后舒新城任社长,姚绍华任编辑,主要撰稿人胡适、黄炎培、陶行知等。《教育与职业》创办人黄炎培,主要撰稿人蔡元培、张元济、余日章、蒋梦麟、陶行知等。《学生杂志》创办者张元济、杨贤江、茅盾,主要撰稿人叶圣陶、郑振铎等。有这些声名显赫、成就卓著、极富社会关怀的民间学问大家加盟,当然确保了相关杂志的学术水准和社会担当。

近代上海教育类专业杂志坚持学理探究和现实关照相结合的办刊原则。作为专业的教育类杂志,教育学的探讨当然极其必要,它决定了该杂志的存在价值。但教育学是极富实践意义的一门学科。离开教育实践,它也失去了存在理由。因此,恰当处理教育学学理探究和现实关照的内在联系,是办好教育杂志的关键所在。近代上海的民间教育杂志,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教育杂志》为例,其初期栏目中,既有主张、社说、评论、学术、教授管理等,又有教育法令、章程文牒、记事、调查、质疑答问以及实验、教材、悬赏披露(获奖教员教案)等等。十年后,有美育、体育、职业教育之提倡,有设计教学法、智力测验、教育测验等研究,也有专评国内教育界新发生教育事件的教育评坛,以及介绍欧美、日本、菲律宾等教育新说和最近教育状况的世界教育新潮栏目。

近代上海的教育类专业杂志坚持世界眼光和中国立场相结合。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教育的变迁不能独立和自外于世界潮流,但前提是必须立足中国社会自身实践的需要,只有将中国立场和世界眼光结合,这样的杂志才会有长久的市场。上海的民间教育类杂志深谙此道。从最早问世的《教育世界》起,就十分关注域外“教育世界”的介绍和研究,包括国外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人物、教育专著直至教育小说的译介。与此同时,也牢牢锁定国内的教育变革进程,密切跟踪其变革路径。以《教育杂志》办刊初期开展的多次社会征文活动为例,其议题从世界各国新教育趋势到对中央教育会提出建议、改定学制,从我国教育上应行革新之一切问题、学校教育应否采用实用主义及实用主义实施法,到中小学堂程度之标准及其衔接办法、初等小学算术教授细目、小学作文教授法、单级教授心得等,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所有重大问题领域。

近代上海的教育类专业杂志还十分讲究杂志编排技巧,增强社会吸引力。在出版市场化前提下,民间杂志没有官方派送渠道,必须形神兼备、内容和形式兼擅方能生存。教育杂志亦然。近代上海民间教育杂志在这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除上述社会征文活动外,还有出版专刊与连载小说等。《教育杂志》就曾结合当时重大教育问题出版过多种专刊,有《讲演号》《学制号》《现代教育思潮号》《道尔顿制专号》《赔款办学计划专号》《小学各科教学法号》《体育研究号》,直至相当前卫、敏感的《性教育专号》等。因为凝聚了同一专题的许多研究信息,专刊比单篇的论文传达出更为集中的信息量,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连载小说也是吸引关注的好形式。杂志上的连载小说,可以充分利用和调动人们的好奇心,欲知究竟的人们因此会不由自主地阅读和购买相关杂志,无意中扩大了该杂志的影响力。连载小说比较著名的有包天笑的著名翻译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意大利

作家亚米契斯原作,包天笑据日译本转译为浅近文言文,发表在《教育杂志》创刊号和第一年第三至第十三期(1909年2月至1910年2月)。

民间教育杂志的创办和贴近民众的办刊特色,使教育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广泛和热门话题,促成了全社会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的浓厚氛围,奠定了教育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舆论和心理基础。

#### 四 编纂出版教科书

编撰出版教科书,是民间因素参与上海近代教育发展的第四大表现形式。

近代上海民间力量参与编撰出版教科书几与新教育同步。因上海的新式教育起步较早,相应地对新式教科书需求也较早。彼时老大帝国主流形态的科举教育体制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不少新式学堂和新学人士便自己动手尝试编纂新的教科书。南洋公学、上海澄衷学堂、上海三等学堂、上海王氏育材书塾等新式学堂均在科举制废除前就推出了若干自编教科书。其中,南洋公学师范生编纂的《蒙学课本》(《新订蒙学课本》)是国人自编新式小学教科书的开端,也意味着中国教科书现代化的开启;<sup>①</sup>澄衷蒙学堂的《字课图说》图文并茂,是清末最有影响的又一套教科书;上海三等学堂的《字义教科书》被评论为我国近代首部用语体文编写的教科书。<sup>②</sup>

与这些主要面对校内学生的自编教科书行为相比,面向社会出版发行教科书籍的民间出版机构群体更值得关注,其问世也较早。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会员单位已有22家。<sup>③</sup>1911年5月前,上海加入书业公所的书局和印刷所达到110多家。<sup>④</sup>这些出版机构多以出版教科书为主营业务。

有学者研究指出,清末出版教科书成绩较为卓著的主要是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其他影响次之、教科书出版数量较多的有中国图书公司、会文学社、普通学书室、新学会社、彪蒙书室、广智书局、群益书社、科学会编译部、上海普及书局、昌明公司、乐群书局。<sup>⑤</sup>民国初年的教科书市场除了商务、中华、世界“三家分晋”之外,上海还有文明书局、中国图书公司、彪蒙书室、新学会社、群益书社、南洋图书沪局、土山湾印书馆、世界书局等参与。<sup>⑥</sup>民国中后期,商务、中华、世界这出版界“三鼎甲”之外,开明、大东也表现不俗,抗战期间形成了上海的5家民间出版社加上贵州1家民间出版社与1家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瓜分全国教科书市场的奇特场景。民间规模更小的神州国光社、上海儿童书局、上海大众书局、上海艺文书社等也有特色教科书问世。

民间大型出版龙头企业间的竞争,以及中小出版企业在大型龙头企业竞争夹缝中的挣扎,共同营造了近代上海教科书出版市场的差序格局。大型出版企业基金雄厚、人才济济,其教科书以系列化规模化为主打产品,中小出版企业则集中有限资金和人力,制作出数量不多但颇具特色的拳头产品。<sup>⑦</sup>竞争的结果,丰富了教科书供应市场,增加了学校的教科书选择机会,也为学生和家带去了售价较为低廉的便利。

近代上海民间出版机构的系列化、规模化教科书主要有:文明书局的《高等小学教科书》《普通

① 南洋公学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实为官办民助而非纯粹官立学校。其教科书编纂也是师生自行为之。故此本文将其列为民间编纂教科书的实例。

②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③ 《图书月报》,1906年1月。

④ 来新夏《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⑤ 此外,所出教科书不成体系且主要采用编译方式、较快退出市场的有群学社、东亚公司、集成图书公司、科学书局、时中书局、(夏颂莱创办的)开明书店、达文社。如今踪迹难觅的小书局也出版过零星的教科书,其与中小学教科书有关的至少有24家。见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142页。

⑥ 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第207页。

⑦ 中小出版企业大多以特色求生存,以理科教科书为特色的有普通学书室、广智书局、群益书社、科学会编译部、上海普及书局、昌明公司、东亚公司等。也有以白话教科书为特色的,如彪蒙书室等。

教科书》《中学(中等)教科书》、中学用《最新教科书》《初等教科书》、高等小学用《新体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初、二、三、四、五集,《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民国新教科书》《单级教授讲义》《实用教科书》《普通教科书》(商务自己未予统计)、《新法教科书》《新学制教科书》《现代初中教科书》《新撰教科书》《新时代教科书》《基本教科书》《复兴教科书》;中华书局的《中华教科书》《新制中华教科书》《新编中华教科书》《新制单级教科书》《新式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新小(中)学教科书》《新中华教科书》《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世界书局的《新学制教科书》《新课程教科书》《小学教科书》《新主义教科书》;开明书局的《开明英文读本》《开明活页文选》《开明国语课本》《开明教本系列》《初中国文科教学自修用国文百八课》《修正课程标准适用教科书》《开明新编教科书》等。<sup>①</sup>

系列化规模化的教科书出版,以其众多的学科门类参与了新知识体系的建构。举凡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中外史学和文学艺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等,几乎近现代人类的所有新知识新发现,都被广泛而迅速地包罗在各式教科书中,通过教师的课堂讲授、课外实验和参与讨论,逐渐地被新式学校学生所知晓,逐渐内化为他们自己的知识储备与积累,不仅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知识观,也间接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科学等近现代理念日益深入可塑性极强的一代青少年心中,并由此而影响及于整个社会。

近代上海民间出版企业大多由集“知本家”和资本家于一身的儒商型人士掌门(如商务的张元济,中华的陆费逵,开明的章锡琛等,北新的创办人居然还是北大的在校大学生),拥有一批中西学问俱佳且颇为敬业的编撰与校订队伍(内中不乏货真价实的教育部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留学欧美的博士硕士,其他术业有专攻的饱学之士,以及富于教育教学经验的一线中小学教师),因而其所出版的教科书质量上乘,涌现了不少标志性乃至划时代的代表作品。如《蒙学科学全书》(开明书局)——国人自编的第一套近代分科设学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我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商务印书馆)——我国最早自编的英语教科书,《绘图文学初阶》(商务印书馆)——有“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之称,《中华教科书》(中华书局)——以“共和国眼光编辑”的民国第一套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中外出版历史上30年内印刷出版次数最多的教科书,<sup>②</sup>也是近代中国小学教科书中第一次编纂出版公民教科书、明确将公民概念引入者,《新学制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百年中国教育史上唯一汇聚顶级社会精英和学界名流的一套教科书,<sup>③</sup>《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第一套以“国语”命名的教科书,《新体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和《新教材教科书》(中华书局)——两套最早适应国语运动的语文教科书,《新法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和《新教育教科书》(中华书局)——首次使用新式标点和注音字母、全面推进白话教学改革的系列教科书,《大学丛书》300多种(商务印书馆)——国人自编的第一套大学教科丛书,结束了清末以来外文原版教科书垄断我国高等教育的时代。<sup>④</sup>

因为质量的上乘,近代上海出版的教科书广受师生欢迎,在市场化前提下一版再版,不仅是几十版次,还有上百版甚至数千版的传奇纪录。如商务印书馆一百版以上的有《复兴国语教科书》(小学初级第四册)120版、单级教科书系列《单级国文教科书》135版,《新体国语教科书》第1册148版,300版以上的有《复兴国语教科书》(小学初级第五册)365版,《共和国教科书》系列《新国文》第二册(初等小学)更是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358版。<sup>⑤</sup>

① 综合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叙述整理。

② 据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第191—192页。

③ 据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第228页。

④ 其他重要的代表性作品还有:商务印书馆周越然的《模范英文读本》;开明书局林语堂编纂、丰子恺绘图的《开明英文读本》,叶圣陶(署名叶绍钧)编写、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开明活页文选》;以及大东书局的系列美术教科书等等。

⑤ 据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第192、213、315、388页。

也是因为质量的上乘,近代上海出版的教科书获得官方认可和好评的较多,在清末和民国历次官方审定教科书书目中占有较大比重:在1906年《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中,商务和文明版占80%以上,<sup>①</sup>在1910年《学部第一次审定中学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并表》中上海版教科书占67.09%,<sup>②</sup>在民初教育部四次公布的教科图书目录中沪版教科书更是高达96.88%。<sup>③</sup>甚至在民国后期官方指定的市场分配方案中,来自民间的沪版教科书也远远超越出自官方者而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主要份额。

近代上海民间出版的教科书,不仅面向新教育发达的大中城市和全日制正规学校,也考虑到欠发达地区、县域城市、非正规学校以及妇女、贫寒子弟等弱势群体的需求,一批定向编撰的教科书应运而生:如专门为简易学堂、半日学堂、夜学堂提供的简易教科书,为女性提供的女子教科书、为乡村提供的乡村教科书、为地方提供的乡土教材、为始业期不同的学校分别提供春季始业、秋季始业或春秋季节始业共用的教材,等等。在这一方面,世界书局的表现较为突出。其出版的新课程标准教科书,有意识地分为小城市和农村用、中小城市用、大都市和海外用、春季始业用、秋季始业用等各套,有的教科书还分为“五彩本”和“普通本”两种,以便不同地区、不同始业期的学校和家庭经济能力各不相同的学子按需选用。其教材销售网络也实行错位经营,将代销网点直接延伸到其他大书局未及关注的广大县域城市,对那里的莘莘学子嘉惠良多。

## 五 兴办私立学校

直接办理私立学校是民间因素参与近代上海教育的第五大表现形式。它有两点特点值得特别关注:其一是私立学校数量特别众多;其二是私立学校创办主体特别多样化。

关于上海私立学校的数量:整个近代时期,公立学校只有洋务运动期间得以在沪暂领风骚,自维新运动开始,私立学校就逐渐呈现出取代官办学校之势。清末大规模兴学热潮中,上海新建各级各类学校凡223所,私人开办者占95.07%。其中,两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女子学堂尽皆私立。<sup>④</sup>民国年间,上海私人办学势头不减,私立学校数量远胜于公立学校。1929—1934年度,上海的初、中、高各级私立学校占同级学校年平均比例分别为72.20%、86.16%、70.61%。其中私立各级各类学校占同级类学校年平均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列次序为:私立初级中学,93.67%;私立中学校,88.25%;私立职业学校,84.98%;私立小学校,79.09%;私立独立学院,78.50%;私立幼稚园,73.40%;私立师范学校,70.17%;私立大学,69.70%;私立专科学校,60.28%;私立初级小学,59.55%;私立高级中学,54.17%。<sup>⑤</sup>

近代上海私立学校的数量奇多和比例奇高,直接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教育市场。由于该市场体量过于庞大,不仅私立学校需要贴近教育市场和社会需求办学,原本不在市场之内的公立学校也在其逼人的压力与引力下,不得不考虑戒除官办习气、改革办学模式、接近市场地气,由此形成了上海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一个以私立学校对公立学校实施倒逼机制的历史性局面。这是规模化的私立学校对近代上海教育的独特贡献。至于私立学校可能具有的过度逐利倾向,则因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近在身边的教会学校和租界局办华童学校的竞争压力,以及上海地方教育行政当局对私立学校间接管理、赏罚并举的管理模式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消解。<sup>⑥</sup>

① 据吴小鸥论文之说为89.08%,据石鸥、吴小鸥合著说为83.33%。前者见《近年来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研究综述》,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7卷3期,2008年5月;后者见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第260页。

② 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第263页。

③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第263页。

④ 综合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县续志》卷九《学校上》、卷十《学校中》,1918年版。

⑤ 笔者据《上海市政报告》资料计算,1936年版,第59—63页。

⑥ 参见施扣柱《民国时期上海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关于上海私立学校的多样化创办主体:主要有来沪移民同乡团体、同业公会和大型企业;慈善机构、一般社会团体和热心社会公益的人士;各类教育专家和教育理想家等。他们共同推动了沪上私立学校的繁荣。

上海移民同乡团体办学肇始于1898年,但清末民初县治时代多为私塾性质。至20世纪20—30年代移民教育开始走向大繁荣和比较正规化发展的阶段。几乎所有在沪移民团体都参与了办学活动,所办学校以中小学尤其是小学为主,含单个小学、连锁小学,共计不下49所。另有至少5所中学。这些由同乡团体出资、组织的移民学校,承担了大量移民子弟的教育任务,仅1935年在校中小學生就有九千五百多人。<sup>①</sup>

上海同业公会参与办学始于1896年,截至1935年,有不下35个行业参与,所办学校以小学为绝对多数,共计45所(含免费义务小学9所),中学1所。仅1935年,以上学校在校生就不下一万零一百余人。<sup>②</sup>其所设课程,除遵从教育部和上海市教育局基本规定外,特别注重各大行业自身的专业类知识技能。<sup>③</sup>

大型企业由于资金雄厚,办学类型比同业公会更显丰富,办学级别也相对较高,如纺织系统办理的私立诚孚纺织专科学校、私立中国纺织工学院、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等3所高等专科学校,授课程度相当高深,是为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为东华大学)的前身。<sup>④</sup>

上海免费义务学校约始于1894年,由各类慈善机构、社会团体、新式学堂师生和开明士绅等办理,其所免之费主要是学费,亦有再全免膳费、医药费者,有的学校还承担了学生继续深造的部分费用。至1935年,此类义务学校至少34所,在校生六千零六十余人。<sup>⑤</sup>

还有各类教育专家和教育理想家等参与办学,如钟天纬创办上海三等公学,马相伯创办震旦大学与复旦大学,王维泰创办育材书塾(南洋中学前身),苏本炎、苏本铤昆仲创办私立中学,匡互生创办立达学园等。由于主办者秉持高远办学理想、勇于教育探索和实践,这些学校日后大多成为个性鲜明、成效卓著的上海名校。

上述各种民间办学主体参与办学,适应了上海城市社会对教育的不同需求:移民同乡团体、同业公会和大型企业参与办学,直接满足了各地移民、各大行业和教育企业的教育需求;慈善机构、一般社会团体和热心社会公益的人士参与办理免费义务学校,满足了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基本教育需求;各类教育专家和教育理想家参与办学,满足了不同层次民众对各类学校的不同需求。这种由教育市场将社会需求分解为不同部分,再由不同主体分别承担的办学格局,比起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办学个体单一的办学格局,更能充分地适应社会对教育、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也减轻了城市教育行政部门直接办学的公共教育财政负担和管理成本。而且,民间多种办学主体参与办学,可以有效避免单一主体办学格局下可能产生的全局性失误,并切实降低此种教育失误的社会成本。

## 六 余 论

综上所述,近代上海教育发展中的民间参与形式多样,从浅层次、履行义务的教育捐款和设立

① 许晚成《上海大中小学校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店1935年版。

② 许晚成《上海大中小学校调查录》。

③ 如金业乙种商业学堂(小学程度):“校中课程,普通学科外,注重英文国文算术及商业各科学。又以商界之算法不在深,故珠算一如我商界之习惯。估看银元为店伙之要务,使之勤习无间。计算利益为庄号所应用,使之操练纯熟。他如银行之汇兑,则英镑之涨缩如何,印度花旗日本之价格如何;钱庄之行市,则拆息之多寡如何,钱串银厘铜元之情形如何,皆为之一一教授。务使学生毕业者,如店铺中满师之徒弟,如钱庄上合用之伙计。行之十年,试之有效。”龚杰《上海金业公立乙种商业学校十二周年纪念杂志》叙,见朱有璠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④ 忻福良等主编《上海高等学校沿革》,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260、262—264页。

⑤ 许晚成《上海大中小学校调查录》,此数据尚不包括同乡团体、同业公会和大型企业办理的义务学校。若一并计算,则截至1935年,上海义务学校至少应为56所,学生8960余人。

基金会,到深层次、行使权利的组建教育社团,编纂出版教科书和教育类专业杂志,以及直接办理私立学校,无不应有尽有,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全方位参与格局。

这一格局的形成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先发性开放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

近代上海的社会开放,有三个关键点不可忽略:一是开埠(1843年),二是租界设立(1845年开始),三是租界内的华洋杂居(1853年开始)。三者缺一不可。开埠意味着上海被迫成为条约口岸城市之一,外部世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由此获得了“合法”进入上海的途径,打开了上海人的眼界;租界设立是在上海的土地上出现了按照西方模式治理市政的模板,其生动的制度演示拉近了上海人与世界的距离,而租界内的华洋杂居则直接将这种近距离缩短为零距离。在上海与世界的亲密接触中,新的经济成分与文化成分开始悄然滋长,新的商人阶层和知识阶层也随之孕育而生。

所有这一切鲜活的事实均发生在清末新政前半个世纪之久。在此长长的时间段中,为数不多的朝廷“自改革”乏善可陈,洋务运动戛然而止,戊戌维新百日而亡,清末新政算是比较全面的制度革新,却又姗姗来迟。足足半个世纪的时间差给了上海民间力量相当充分的生长时间与空间,在中央政府内外交困、自顾不暇之际,这种生长处于相当自由的放养状态。教育领域亦如此。看一下改革的时间清单: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科举制正式废除,在这些政府层面发动的制度化教育改革之前,上海的民间力量已然捷足先登:中国教育会(1902)、群学会(1904)等教育社团,商务印书馆(1897)、文明书局(1902)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机构及其所出版的教科书籍,《教育世界》(1901)等专业类教育杂志,以及十余所私立学校(最早的正蒙书院建立于1878年),<sup>①</sup>哪一样不是远远跑在政府的规定动作之前?得益于上海社会的先发性开放,在政府视线之外悄然坐大的上海民间力量,其在教育领域的这份先发与先行,使得其在日后与政府力量的博弈中,拥有了足够的实力与底气。

这一格局的维持是民间力量和政府力量巧妙博弈的结果。

跑在政府之前参与教育发展的上海民间力量,绝大多数并无“彼可取而代之”的政治想象。<sup>②</sup>相反,在近代中国如达摩克利斯之剑般高悬头顶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们与政府之间借助救亡图存、建设强国的共同目标形成了可以合作的利益共同体。而且身处中西文化交流前沿的上海民间力量,不仅欣赏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也相当熟悉与认同西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制精神,以及近代市场经济、公司制度和企业文化所蕴含的规则意识。因此,在与政府携手合作发展教育的过程中,上海的民间力量既有对于自身利益的坚守和市场份额的追求,也表现出对于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守。例如私立学校努力按照教育行政机构的立案标准办学并申请立案、服从管理,出版机构根据历次学制改革和课程标准的更新不断推出新的教科书版本,等等。

面对相当强势但态度友好的上海民间力量的教育参与,政府方面基本采取支持的立场,同时努力创造条件试图加强政府介入。它们一方面羞羞答答承认囊中羞涩,号召民众有钱出钱,以大量捐款兴学帮助政府减轻公共财政负担,同时也采取了加强教育领域官方干预的种种举措,以教科书管理为例,仅清末就先后建立了京师大学堂、总理学务处和学部总务司下属的审定科等多个机构,同时订立和出台教科书审定标准,直至建立学部图书编译局、直接出手编译教科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大了对教科书的强势干预,明确规定,各种教科书必须经审查后方可采用;所有教科书审查由国民党中央统一负责;审查以所有教材指导思想符合国民党党义为基本标准。<sup>③</sup>抗战期间更是借着抗战的理由名正言顺地拉开了国定教科书的大幕。即便如此,在理科类教科书编撰和所有教科

<sup>①</sup> 朱有璠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214、468、471、488页;下册,第598、859-861页。

<sup>②</sup> 蔡元培创立主持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只是在清廷灭亡之前以革命为主旨,民国成立后便转为常态的教育社团和学校机构;中华职教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非政治社团。

<sup>③</sup> 教育部训令第754号“凡教科图书概归本部审查令仰遵照”,《广西教育公报》,河北省档案馆藏第3卷第10号第3页。“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92。转引自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册,第333页。

书的发行方面,依然给民间教科书出版机构留下了相当可观的操作空间和盈利空间。在官方强行建立的教科书战时供应体制下,<sup>①</sup>其分配的市场份额中,官方机构中正书局只占22%,<sup>②</sup>民营的中华和商务各占22%,剩余的34%不等额地分配给其他四家出版机构,内有三家出自上海,即世界、大东与开明。综合起来看,上海的民营出版群体依然是教科书市场的主角。

这一格局的最大价值是教育民主得到了较为充分地体现。

教育民主不仅意味着民众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更在于民众享有法定的办理教育的权利,具体而言,民众有权依据宪法的保障,将明文规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具体化为组建教育社团、办理教育类专业杂志、编撰出版教科书籍乃至直接办理私立学校的当然权利与具体实践。对民众来说,这些权利不可放弃;对政府来说,这些权利是他们做出的有限让渡。在近代上海民间和政府共赴国难、民族根本利益一致的大前提下,这个让渡绝没有威胁到政府本身的存在。相反,由于尊重了市场的规律和民间的盈利空间,这个让渡使得政府方面在减轻教育公共财政负担的同时,<sup>③</sup>赢得了民众泉涌般的办理教育的热情和无穷的创造力。民众方面,则在赢得适度经济利润的同时,得以较为充分地实践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基本上这是一个双赢的历史格局。这一格局并非尽善尽美,但它却是历史所能提供的比较好的选项。

在近代上海民间全方位参与教育、教育民主得到较为充分体现的过程中,资本家群体和知本家群体是两大决定性力量。他们的共同参与,使得教育发展获得了资金和知识两方面的鼎力支撑,两大群体本身也在此过程中最终完成了由前近代时期的绅商向近现代社会的新型资本家和知识人群体的历史性转型。其中的知识人群体,原是由于科举制的废除被斩断了与旧体制紧密连接的生命脐带,其最初的向社会讨生活带着某种无奈,结果却在被迫的讨生活中发现了最适合他们生存的文化教育领域:在市场化前提下,无论是搞出版、办杂志,还是建社团、开学校,不仅可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同时也可以实现他们改造社会的文化理想。而且,经济的独立造就了其群体人格的独立,新型的知识人群体再也不是依附于旧体制上微不足道的毛发,他们有舆论力量发出自己的呼声,也有行动力量影响社会变革的进程。

(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现代上海私立学校研究》的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13BZS096)

(责任编辑:何方昱)

① 国定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简称“七联处”。除中正书局外,其余六家皆为民营机构,上海占了五家,即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

② 这是近代官方出版机构在教科书市场所占份额最高的一次。

③ 尽管上海的私立学校比例奇高堪称全国第一,但民国年间上海历年教育经费结构中,政府投入依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民间的鼎力支持,上海的教育公共财政会是怎样的不堪重负!